



敲打鍵盤

外儒內法

中國在 1910 年代興起一場改變歷史的新文化運動，他們標舉德先生（德模克拉西 Democracy）與賽先生（賽恩斯 Science），也就是民主與科學，認為這才是中國要成為現代國家的根本條件；推究這百年前的往事，緣於民初袁世凱的帝制復辟，為抗衡尊孔復古的逆流，陳獨秀等知識菁英遂高舉「打倒孔家店」、「文學革命」的大纛。歷經多次的文化論戰，乃至中國文化大革命、台灣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，八股科舉文化早已被揚棄。

近年，「搶救國文聯盟」的聲浪甚囂塵上，表面上，是有感於時下學子們語文程度低落，於是要求增加高中國文科的文言文比例，頗有以興復文言文為職志之態勢。近月來，教育部「配合演出」：決定將高中的選修科目「論孟選讀」改為必選的「四書」，並美其名為「中華文化基本教材」，等同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時期的「中國文化基本教材」借屍還魂，可笑的是他們冠冕堂皇的理由，教育部次長陳益興說：「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屬於文化涵養課程，目的在提升學生品德教育。」（聯合報，2011.3.2.）於是，我們彷彿見到袁世凱時代復辟幽靈的再現。

品德教育豈是閱讀四書就能解決的問題，四書無罪，文以載道這責任忒也沉重；幫襯的課綱委員也不甘寂寞地呼應，政大中文系董金裕教授說：「以前高中有教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時，學生文化涵養較好，改成選修後，禮儀品格漸淡。」（自由時報，2011.6.17.）這樣的論斷真不知所據何來？夢囈式的說辭實是令人匪夷所思。佛光大學文學系謝大寧教授大概也了解四書給人的刻板印象，自我解套的說：「四書教法將不重背誦，強調的是『時代性、在地性、實踐性』。」（自由時報，2011.6.17.）在考試掛帥的體制下，不背誦而能得高分，簡直是緣木求魚，至於四書能有「時代性、在地性、實踐性」

，未免譁眾取寵。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戴璉璋教授，發現「儒學成了被鄙棄的意識形態」，乾脆說反對者是：「躺在蔭下納涼的人，卻說相關的經典是現代科舉的牢籠！」（聯合報，2011.7.12.）

從古至今，四書為什麼會被推崇到如此高的位階上？漢武帝劉徹首居其功，他採納董仲舒的論見：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；其目的乃在於儒家的大一統思想、君臣倫理觀迎合了他的政治需求，因而揚棄無為的黃老治術，當然，劉徹也不是真心有意於儒術，他披著儒家的外衣以搏得仁君的美名，在統治上仍依循秦代的法家之治，如此，漢儒實是揉雜了法家及道、墨、名等各家思想的混合體。外儒內法鞏固了帝王巡狩天下的極度威權，而為歷代君王所承襲。

唐代開科舉取士之風，考科逐漸定型為四書五經，百家學說始日漸淡出於儒學，八股文體更使儒生患了知識偏狹症，思想不張；迨西力東漸，王道何在？

四書無罪，但與品德教育何干？語文能力低落，又何關文言文幾何？課程改革如不能真從教育著手，豈能怪他人政治操弄的指責！強說別人是因「意識形態」而反對，不正也是施政者在玩弄政治權術？

我們的教育官員要到什麼時候？才會認真地從教育的立場從事教育改革。□！□□□□，民主時代，□□□□□□？現代國家，還玩外儒內法，□□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□□。

南台通識電子報第三卷總編輯 林柏維

